

史記彙纂



资深专家经典讲述
史记入门通俗读本

史记讲座

韩兆琦 著

过去人们总爱说《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不错，人们也总是说《史记》是史诗，是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讲这也不错。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史记》是司马迁对先秦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弘传，是对先秦士人群体风貌的礼赞，同时也是对自己独特人格的塑造与锤炼。司马迁先秦以来以及汉初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也是终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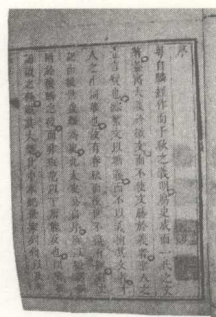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兆琦 著

史记讲座



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讲座/韩兆琦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633-7114-3

I. 史… II. 韩… III. 史记—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3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4.25 字数:30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我系统读《史记》是从1959年冬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我讲授《史记》作品是从1963年秋后,给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讲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当时伴随着读书讲课还写了一些“读史笔记”,重要的题目有《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周亚夫之死》《〈魏其武安侯列传〉所展示的学术之争下面的夺权与反夺权》等等,有兴趣的学生还曾借去传抄。我开设专题讲《史记》是从1978年冬,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讲课开始。讲课的同时写了几篇与《史记》有关的习作发表,如《司马迁的求实精神》《关于韩愈的〈伯夷颂〉》等。随着1980年秋后给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开设“《史记》研究课”,并着手编写这门课的教材,期间我的《史记选注集说》《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通论》也相继出版,这门课遂成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函授班、分校、夜大、自学考试等各方面学生的常设课程,时间达二十多年之久。可以说,我这几十年来的教学活动与《史记》分不开,我这几十年来的主要学术研究也与讲授《史记》分不开。

我的习惯是站着讲课,站着讲课没法看讲稿,所以我在第一次讲述某个问题前通常是没有讲稿的,我只有讲课提纲与相应的引用资料。手里拿着一张简单明了的提纲,偶尔看一眼;遇到该引用原文的地方再拿起桌子上的原始资料读一段,这样讲课很自然。把讲课用的提纲与原始资料进一步加工成为详细的讲稿(也可说是文章)是不太困难的。但即使有了这些详细的讲稿还是不能就照原样去给下一次听课的学生照本宣科,还是要重新写新的讲课提纲,以便讲课使用;而旧讲

稿(也许是单篇的,也许是成册的)则可以发给听课的学生做参考。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滚动教学的基本模式。

这些有关《史记》教学的讲稿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于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的总体介绍与评论;第二类是对于《史记》单篇教学的讲稿,分析评述作品的思想、艺术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于作者生平思想或是对《史记》作品中某些具体问题的专门探讨,如司马迁的生卒年,《史记》的版本,《史记》文字的校勘,《史记》中某些人物事件的考辨等等,这些都很难面向初次阅读《史记》的学生展开细讲,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学生一些有关的信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史记讲座》,便开始对几十年来的讲稿进行了一些筛选。从《史记评议赏析》《史记通论》中选用了一部分,把原来讲过的题目重写或者大量修改了一部分,又按照编写要求专门新写了一部分。由于是给《史记》的一般读者使用,故而围绕读者最关心和感兴趣的一些基本问题和专题,用新材料新视角加以贯通,语言上尽量做到通畅流利,生动活泼。

本书中的《史学之父的创举》是张大可先生协助撰稿;《揭秘汉武帝尊儒的真相》与《记录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是陈曦君协助撰稿,特加说明并深表谢意。

韩兆琦

2007.12.22

目 录

前 言	1
-----------	---

司马迁其人

第一讲 时代、家世与生平	3
第二讲 受宫刑忍辱著书	16
第三讲 史学之父的创举	25
第四讲 多民族的大史记	40
第五讲 第一次把经济问题写入史著	47
第六讲 汉朝政治批判	59
第七讲 忍辱奋争的生死哲学	67
第八讲 揭秘汉武帝尊儒的真相	74
第九讲 记录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91
第十讲 先秦士风的终结者	105

《史记》其书

第十一讲 《史记》的一些常识	115
第十二讲 《史记》五体说例	126
第十三讲 《史记》是实录吗	133

第十四讲 史学著作的文学观	144
第十五讲 《史记》如何写人	154
第十六讲 英雄人物的悲剧故事集	167
第十七讲 《史记》的“无韵”之韵	178
第十八讲 《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	189
第十九讲 《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	208
第二十讲 《史记》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	223
第二十一讲 《史记》叙事的讹误与疏漏举例	242
第二十二讲 近年考古成果对《史记》文本的验证	255
第二十三讲 褚少孙补《史记》	264

名篇解读

第二十四讲 《陈涉世家》解读	273
第二十五讲 《项羽本纪》解读	283
第二十六讲 《留侯世家》解读	296
第二十七讲 《淮阴侯列传》解读	310
第二十八讲 《游侠列传》解读	320
第二十九讲 《魏公子列传》解读	328
第三十讲 《廉颇蔺相如列传》解读	337
第三十一讲 《李斯列传》解读	345
第三十二讲 《史记》十表解读	356

附录: 介绍六种《史记》注本	376
----------------------	-----

司马迁其人

第一讲

时代、家世与生平

一、司马迁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又催生了伟大的历史文化。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指出:“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最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稟赋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所以赖明德认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使司马迁孕育了他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学术文化从多元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难求;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了被蹂躏的人性是多么的可怜,被压抑的人权是多么的可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那是一个笼络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是一个磨炼天才的社会。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因此,要正确了解和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强盛的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经济上,由于秦末

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建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已经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司马迁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犢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创立于秦始皇,但只昙花一现,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过多,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税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代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显著加强。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领土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区域。推恩诏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在削平诸侯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封建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他的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所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伐大宛,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使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具备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西汉建立以来文化事业的开放发展也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并不准民间藏书和读书以后,古代文化濒于灭绝的境地。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是指文献资料的搜集情况而言。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纠集门下学者编集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宏伟的《论六家要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马迁的《史记》写作,就是在当时学术进行综合、总结的气氛下进行的。而汉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从古代到当时社会发展的全貌,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为社会发展做借鉴,以达到补敝起废的目的。司马迁正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西汉,除了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外,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

果。尤其是政论文和辞赋的成就,对《史记》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汉前期的各家政论文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视总结国家兴亡的教训,以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述的重要内容。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当时的政论家贾谊、晁错等人,都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作了肯定,司马迁更是把这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子写《春秋》成“素王之业”、“为一代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识见外,也是受了贾谊等人的影响,所以他把贾谊的《过秦论》直接收在《陈涉世家》后面作为该篇的论赞。从文章风格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忌的特点,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史记》文章也显然有这种特点。《史记》以“实录”著称,司马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锐,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无顾忌,文章中洋溢着作者匡时救弊的热忱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汉初散文有时为了讲究文章的气势而常常忽略细节的真实,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加以夸张,这种例子在《史记》中触目皆是,而《史记》文章所以精彩动人,也正和《史记》文章的这种讲气势、重感情密切相关。

从西汉前期开始,辞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散文普遍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迁擅长写赋,本身也是一位辞赋家,所以《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辞赋的特色。在语言上,它韵散结合,句式长短相间,音节和谐,抑扬有致,而且重铺叙,多排比,议论风发,气势磅礴,错落上口。我们认为,《史记》之所以文采照人,这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鉴汉代散文、辞赋的表现手法及语言艺术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们还不太重视。

以上说的都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一面,是影响司马迁那种积极豪迈、豁达宏伟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随着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统治者物质与精神的掠夺欲望的膨胀,一种为维护统治者专制独裁,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出台了,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汉

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针对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采取的对策。按照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他们表面上说是尊“儒”，其实这种“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轲，它们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政治作粉饰、作辩护的东西，是最浅薄、最赤裸裸地为汉武帝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货色。“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的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成，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动摇，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就正好是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记》中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的。

二、司马迁的家世

关于司马迁的世系，历史材料很少，唯一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追述，他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阼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段叙述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司马迁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他说他们家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他以自己出生于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而自豪。因为他家曾世代代为史官，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担任史官，而害怕这种传统在他们手里中断。同时，这种家世，还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这种优良的品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以修史为己任，在兴旺发达的汉武帝时代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述史的任务；二是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像齐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反抗精神，以及他们宁死也要直书的强烈的正义感。司马迁后来惨遭酷刑后，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在司马迁的祖先中，司马错等人作为司马氏家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与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和其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关系。张大可同志在论述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说：“司马氏祖先源远流长，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臣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立功名。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垂名于多种典籍之中。《诗·大雅·常武》赞颂了他的事迹：‘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阵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条亦述载此事。从此，休甫之后裔以司马氏为姓，传习兵法剑术，出了好几位名将。《太史公自序》作了亲切的记载。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的司马氏，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与白起同时，年齿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位显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

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白起事秦昭王三十七年。两人友谊深厚,曾并肩作战。秦昭王十八年(前289年),司马错与白起共同攻魏,取垣、轵等大小六十一城。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列传》、《白起列传》等篇记载,司马错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在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长平战后,秦军分为三路攻赵:白起自率一军定上党;王齕率一军取赵皮牢;司马靳率一军北定太原。公元前257年,白起不肯为将攻赵邯郸,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连坐而死。白起不肯为将,因为他认为攻围邯郸不能取胜,他宁死也不做败军之将。秦军攻围邯郸,诸侯救赵,果然失败。司马靳连坐而死,由此可见他与白起关系之密切,大约也是不肯做败军之将拒绝出征而被赐死。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种思想和品德在其子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身行言教之中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法周公以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阵的兵学,就这样在《史记》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司马迁的战争观》,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第三,在司马迁的先人中,还出现了两位经济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铁矿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有关司马昌和司马无泽的详细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既然能在当时做经济官,那么他们自然具备管理经济的专门业务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离司马迁都不算太远,在一个很重视家学渊源的家庭里,他的祖先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及知识,肯定会程度不同地被流传下来。司马迁熟悉各地的物产和市场行情,具有较好的经济头脑,我们认为这和他从小得到的家教有关,在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似乎应该考虑到这一层。

司马迁的家世久远而简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 110),生年未详。他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令的级别并不高,但司马谈很珍惜这一职务,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并决心坚守这个职业。他经常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自觉的历史家。为此,司马谈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司马谈的督促和培育下,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后又向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至于司马迁的壮年漫游,也是司马谈为司马迁以后写史作准备的一次精心安排,和纯粹的游山玩水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个真正的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可以说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融贯古今,兼通百科的大学者。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写了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家,他比较公正地评论了各家的优劣长短,而竭力肯定了道德家的学说。而《史记》中的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受了司马谈影响的结果。《论六家要旨》强调六家并存,认为它们都对治理天下有重要作用,只是方法不同,不能一概废弃,表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博大心胸。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继《春秋》以后编纂一部新的史书,司马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搜集材料,拟订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最后临终前又遗命司马迁,鼓励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心血的结晶,司马谈的遗嘱,成为司马迁著述的动力之一,《史记》的最终写成,也是司马迁完成父命、怀念父亲的一种表现。